

《炎黄文化漫游》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李耐因

编 委：翟志瑞 吕桂申
程宝昌 陈伟光

执行编委：翟志瑞

序

戴逸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对人类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著称于世界。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物质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水利事业、医药、冶金、陶瓷、织造、建筑等许多发明创造，曾经领先于世界；我们的祖先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军事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及伦理道德方面，也创造了光辉的思想理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上一切炎黄子孙的骄傲。

中华炎黄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我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密切交往，学术文化相互渗透，犹如千河百溪，终于汇聚成巨川，形成以炎黄文化为主体的、丰富多采和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牢固的稳定性和巨大的凝聚力、创造力，可以说正是根植于这

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和沃土之上。

中华炎黄文化,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过来又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统一和进步以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从事的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要内容,必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因子。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把民族精神振奋起来,把炎黄子孙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振兴我们的国家,这是当代中国人以及今后几代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

弘扬中华炎黄文化,必须认识、了解、普及中华炎黄文化的基础知识和重要内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这一套包括20分册的《炎黄文化漫游丛书》,正是为此目的而编著的。这是一套普及读物,基本上包括了传统文化的各重要领域。为了适应青年读者的需要,这套丛书编写过程中注意了通俗、精要、准确和趣味性,以便读者在轻松、有趣的“漫游”中,获得炎黄文化的一些基础知识。

目 录

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	(1)
	“有熊国”到底在何处?	(1)
	黄帝与炎帝是啥关系?	(13)
	简释炎帝称谓的各种“谜”	(15)
	炎帝是否为“神农氏”?	(21)
	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前因后果	(23)
	趣谈黄帝的“景云之瑞”	(32)
	黄帝为什么战炎帝?	(40)
	阪泉究竟在何处?	(49)
	错误的阪泉记载是怎样产生的?	(62)
	涿鹿、阪泉两役的历史意义	(72)
	黄帝是否肇造了国家制度?	(78)
	釜山在何处?	(84)
	龙是中华民族族徽	(87)
	黄帝死于何因? 葬于何地?	(95)
	说一说桥山的搬家史	(103)
二	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	(107)
	“仓颉造字”是怎么回事?	(107)

黄帝“迎日推策”所反映的是什么？	(113)
从指南车到指南针	(116)
中国自何时始有乐器合奏？	(119)
中国自何时而有诗歌创作？	(122)
略说“垂衣”与“虫蛾”	(123)
黄帝造舟楫可信吗？	(126)
车的发明者究竟为谁氏？	(128)
黄帝时期的医学发展如何？	(131)
黄帝之时有无刑法？	(140)
略谈黄帝念念“不忘者”	(143)
为什么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特别多？	(147)
三 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	(153)
引语	(153)
蒙古族是如何形成的？	(156)
满族是如何形成的？	(159)
简析藏族历史之根源	(161)
敕勒、回纥、维吾尔	(164)
柯尔克孜族的历史	(165)
回族形成探源	(166)
苗族的历史之根	(168)
高山族的历史形成	(172)
汉族的历史	(174)

	黄、炎二帝与我国南方民族的形成 …	(177)
四	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	(183)
	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	(183)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 ……………	(191)
	民族思想的历史变易与民族兴衰……	(203)
	如何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206)
	研究黄帝、炎帝史事应有的态度 ……	(210)

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

“有熊国”到底在何处？

远古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氏族和部落。根据现存的古书资料记载，原始社会发展到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社会生产特点的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已经出现有熊氏、有娲氏（即西陵氏）、方雷氏、彤鱼氏、有娥氏、夙沙氏、蜀山氏以及补遂、九黎等大小部落。部落之间经常进行着军事混战。《战国策》卷三所载的“神农伐补遂”，《吕氏春秋·用民》所记的“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史记·五帝本纪》所述的“神农氏世衰，诸侯

相侵伐，暴虐百姓”等，就是这个时期部落之间战争的写照。而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以战争的手段制止野蛮性的掠夺战争，建立国家制度，开创中华文明历史新纪元的，就是有熊部落军事领袖轩辕黄帝与行政领袖榆罔炎帝。

史载黄帝、炎帝为“少典之子”。自三国时蜀光禄大夫谯允南说了少典为“有熊国君”之后，对于“有熊”，有说是国名，有说是具体地名，也有说是黄帝都邑。因为皇甫谧认为有熊即河南新郑，所以他的认识就与历代典籍所载的“黄帝都于涿鹿”发生了冲突。于是，他就在一个“或”字上做开了文章：“黄帝都涿鹿。或以为都涿鹿，迁有熊；或以为都有熊，迁涿鹿。”或来或去，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现代自图腾崇拜学说观点盛行后，又有人说“有熊”是氏族名称，由此而断言黄帝是熊图腾崇拜之族，等等。

其实，“有熊”既非氏族名称，亦非依图腾崇拜而得，因为黄帝、炎帝的族属所崇拜的图腾物为“龙”。龙的形貌是依“蛇”而有。黄帝与炎帝都不崇拜“熊”。严格地说，“有熊”亦不能算做国家名称，而只是一个部落名称。其名称所得，是依其部落所在之地有熊耳山脉而得其称。

图腾崇拜在中国的原始社会里，只存在于母系氏族历史时期，而且是一个氏族中有一种共同

的图腾崇拜物，每个氏族都由此而得其名称。到了因私有制的产生而引发了氏族之间的掠夺性战争之后，为了增强战斗力而由几个氏族共同组成一个部落的时候，部落名称就不再依原氏族中的图腾崇拜物名为部落名了。这是因为依任何一个氏族所崇拜的图腾物名为这个部落的名称，都不能代表全部落中各氏族的人，也不会得到全部落的共同认可。这个时候及其以后的一段历史上，部落或部落方国，一般都是依部落所在地的高山、大河或都城之名为其名称。有熊部落也是因地处熊耳山脉周围而得称“有熊”的。

在中国，“熊耳山”是很多的。那么，有熊部落所在地，亦即古史籍所载的“有熊国”其地域有多大？在现在的什么地方？对此，我们只要从史事记述、历史地名与位置的记载、遗址遗迹的调查、考古研究、文物发现和科学测定等，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证，就可大体上得到一个确切的认识。

一、关于黄帝出生和居住地。既然史载黄帝、炎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那么黄帝出生与居住地自是有熊部落中心。《史记·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之语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皇甫谧此说是将先秦各家之说汇集一锅而炒，作了一个串联，而未分清正确与错误的说法。“长于姬水，

因以为姓”，是据《国语》所载晋大夫胥臣臼季为劝晋文公纳其侄媳而编造的一个“德不同就姓不同”的错误说词。黄帝时期虽已是父权制时期，但仍沿用母系氏族时期从母得姓“以别婚姻”而限制近亲婚配的习俗，并不是其姓姬就是因姬水而得。他也未曾长于姬水。黄帝之名轩辕，也非因居轩辕之丘而得，倒是轩辕之丘本名青丘，因其出生、居住、建都于此丘，便以其名命称此丘为“轩辕之丘”，亦称轩辕之台。“寿丘”是轩辕之丘的一个别号，那是因黄帝长寿，特别是传言其后代中出了个篳铿活了八百余岁，故称轩辕之丘为“寿丘”的。皇甫湜不明此因，故将生、居之处因名称不同而视作两个不同的地方。对此，证之以郭璞之说，《山海经》之载，便自然明白。郭璞在《山海经》关于“轩辕之丘”的注释中说：“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山海经》各经之文是依山脉走向等为经纬，对中华大地各地地名、物产等作纵横交叉式的记述，因而各经经文可以互证。轩辕之丘的地理位置在灵山以北，穷山之南。“我们依《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经文记述，按‘肃慎之国’、‘白民之国’、‘北狄之国’的地望已知来确定‘灵山’、‘轩辕之丘’的地

望，证实灵山，即今河北省涿鹿县南之灵山，‘轩辕之丘’与‘轩辕之台’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涿鹿之阿’实为一地，都是指早在北魏之时就已颓废的古涿鹿城遗址。其地在今涿鹿县东南矾山镇三堡村北。”（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第135、136页）历代地理著作之载与《山海经》一致。如《魏土地记》称：“下洛城（今涿鹿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水经注·漂水》道：“涿水出涿鹿山……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播陆也。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括地志》言：“涿鹿故城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

轩辕之丘遗址，确如《山海经》所载，为方形。现残存夯土城墙三面，东城墙被修水库拆毁了一段，城墙残存高度在5至10米之间，底厚约10米，城内面积25万平方米有余，到处都是磨制石器及陶器残片，现未经发掘，但自然出土的文物极多。

所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在原始社会部落分布图中将涿鹿标明为有熊部落中心，是深有见地的。

二、熊耳山周围的远古居民。黄帝与炎帝所在的部落之所以依地有熊耳山脉而得名曰“有熊氏”，是因熊耳山脉所在的地域正是中华远古居民始终在此长期聚居、繁衍、发展，并且社会进步最

快的一个中心区域有关,这就是桑干河流域。

桑干河流域是加里东、燕山、喜马拉雅等地质构造运动应力接合与转换地带,以桑干河谷为界,北面为阴山余支的熊耳山、燕山余支的海陀山以及大马群山等,南为恒山、太行山脉及其余支的小五台山、灵山、军都山等。因先后受来自不同方向的加里东运动、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的应力所致,各山脉、河谷向着不同的方向褶皱、扭曲、隆起、断裂、下陷,这就造成了沿桑干河及其支流壶流河、洋河等水系的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如怀安、张家口、宣化、龙关、赵川、阳原、蔚县、涿鹿、怀来等盆地和谷地。这些盆地在其形成过程中,又控制了本区域内的水系发育,形成了串珠式的古湖,如大同古湖、涿鹿古湖等。其中,熊耳山脉南缘的大同古湖,其水域占据了今河北省阳原县、蔚县,以及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怀仁县、应县、山阴县、朔县、浑源县、广灵县的大部分地域,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

这种地质构造上的特殊单元,造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地方性小气候,不仅给古生物的繁衍造成了一个良好的地理环境,使第三纪残留下来的长鼻三趾马、爪蹄兽和第四纪标准属的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步氏大角鹿、巨骆驼、四不象鹿、板齿犀、鸵鸟、野马、野驴、野猪、羚羊、短

耳兔、中国鬣狗、剑齿虎、多刺鱼、鲤鱼、蚌、螺等动物在此大量生存,而且为古猿向着古人类、现代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提供了少有的优越条件,使得桑干河流域成为中国原始居民从原始社会形态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区域。在这方面,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们的发现、研究以及一致的认识,就是最充分的证明。

古人类及文化遗址有:

泥河湾遗址,发现于 1924 年,其地层距今 300 至 152 万年之间,是我国华北第四纪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为全世界所少见。英国、德国学者先后进行过调查与发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过发掘,裴文中、贾兰坡、刘东生、周明镇等以及欧洲、大洋洲的学者先后进行过调查,1979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也曾到此考察。此遗址发现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与石器,是寻找我国早期人类化石的重要地点。

小长梁遗址,是比元谋人更早的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早期人类遗址,距今 250 万年左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发掘中,获得石核、刮削器和制作石器的燧石等 800 余件,以及大量被丢弃的三趾马、羚羊、牛、鹿、犀虎、象等的残渣剩骨。地点在桑干河南岸

北京人，其化石发现地址在桑干河下游的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北山洞中，距今 50 万到 23 万年。

许家窑人，其化石发现于桑干河上游的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与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之间，人顶骨、枕骨、上颌骨和白齿化石至少代表十几个男女老幼个体，距今为 10 万年左右。

峙峪人，遗址在桑干河上游的山西省朔县峙峪村，为“泥河湾层”西缘，共发现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镞等 15000 余件，距今约 2.8 万年左右。

山顶洞人，遗址在桑干河下游周口店，距今 1.8 万年。

虎头梁遗址，在桑干河北岸，分布为虎头梁、西水地、六马坊、七马坊等九个地点，背依熊耳山脉，石器类型很多，有大量细石器发现。其制造技术和类型与日本石器时代的遗物有很多共同之处。距今为 1 万多年以前。

以熊耳山脉为中心的桑干河流域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极为丰富，除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阳原县泥河湾所属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部分发掘，1979 年由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张家口地区博物馆共同组成的张家口考古队，对蔚县壶

流河流域的筛子绫罗、庄窠、三关几个遗址发掘并报告外,其他如怀安、尚义、万全、宣化、崇礼、涿鹿、怀来等县的遗址都未发掘。仅依 1978 年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中按地表所见文物而言,属于仰韶文化遗址的有三关、三营、庄窠、蒋家梁等,属于龙山文化遗址的有马站、彭大崖、珠窝园、焦庄子、贾堡、筛子绫罗、大门沟、石咀子、西相广、高家屯等。古城址达 40 余处。

桑干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按已发现和发掘而显示,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着前后时代很久的延续与继承性。如“三关遗址(代号 YSG)的主要堆积为相当仰韶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一些相当龙山文化阶段的灰坑直接叠压或打破上述文化遗存的地层和遗迹。在遗址的断崖上,尚见有青铜器时代或更晚的文化遗存……三关遗址发现这个时期的房屋基址 6 座,不在同一平面。房屋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坐北朝南,平面呈扇面形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一般在 40 平方米左右,其间距不等,最近者仅 4 米”(张家口考古队:《1979 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载《考古》1981 年第 2 期);二是细石器相当丰富,最早的发现于一万多年以前的虎头梁遗址群,“筛子绫罗出土的 809 件细石器竟占石器总数的 64%。这便构成了这种遗存的一个鲜明特点”(同上)。正因为如此,

尤玉柱和李壮伟在《从桑干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在桑干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他们更认为，桑干河流域可能是东亚、北亚和北美广大地区石叶系统细石器的发源地（引自王世民：《1980 年的中国考古研究》，载《考古》1981 年第 3 期）。1980 年 11 月，安志敏在应邀参加日本明治大学建校 100 周年和考古学研究室及考古陈列馆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时所做的学术讲演中还说：“细石器的出现以华北为最早，不仅中国境内分布广泛，还影响到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的广大地区，既见于许多不同的文化系统，而延续的年代又比较长，但它不同于以欧洲、北非和西亚为中心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这是值得探索和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问题之一。”他还指出，细石器“盛行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其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黄河流域的细石器突然衰落下去，不过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保留少量的细石器”（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载《考古》1981 年第 3 期）。

三、炎帝焚林垦荒的“烈山”遗址。它在今涿鹿县城西南 12 公里的龙门山顶上。地处桑干河南岸，中间是桑干河穿越的朝阳寺山峡，山峡北面即

是熊耳山脉的黄阳山。东南距轩辕之丘 27 公里，西北距泥河湾盆地 21 公里。其焚林垦荒之处为一山顶平地，“周围石骨嶙峋，山顶有土田四百亩。登之，四垣齐密，隐如城郭，不知为万仞山巅”（清康熙八年版《保安州志·山川考》）。今依山顶有田四百亩而称“四顷梁”，其田仍为农民所耕种。梁下有“龙门叠翠”奇景，为涿鹿古八大景之一，今因修龙门水库而遭破坏。所以，古史载炎帝“兴于熊耳、龙门”是正确的。龙门山自炎帝焚林垦荒后，史载为“烈山”，至其子柱继而耕作，史籍记为“厉山”，到了舜耕于此山时，史书又记为“历山”。其实，烈山、厉山、历山本为一山即龙门山。

炎帝，因其历史活动中的特殊原因和地位的改变，历代都不以帝王大礼禘祭，而只在一年四季的郊祀中祀以南郊。所以，炎帝焚林耕种之山建以舜庙，是历代帝王祭祀虞舜的地方。如北魏明元帝于神瑞二年（公元 415 年）六月“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今涿鹿），登历山，祭舜庙”。孝文帝元宏于太和十六年（公元 492 年）二月“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魏书·帝纪》）成为定制。

综上史事记载、地名记述、遗址遗迹、文物发现、考古研究与学者专家们的认识，证明了以下几